

· 海外汉学 ·

2015 年日本学界的明清史研究

(日) 冈本弘道 (县立广岛大学国际文化学科 日本广岛县) 撰
阿 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编译

本文概要介绍明初至鸦片战争的明清史研究成果。当然,有些重要议题也会触及后续时期。

明代的政治。滨野亮介《明代洪武初期无祀鬼神祭祀政策的意图》(《大谷学报》95-1)考察了洪武皇帝在制订礼制的过程中,对于本来与儒教教义无关的鬼神祭祀政策施加的影响。新宫学《被剥夺首都地位的南京》(《东洋史研究》74-2)以《洪武京城图志》为线索,深入地分析了永乐迁都时的政治情况。川越泰博《明代护陵卫考》(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纪要》82)以明代长陵卫、献陵卫为中心,考察了明代守卫帝陵的护陵卫的情况,指出护陵卫的活动范围更为广泛,已经超出了其原本设置的目的;他的《明代的蜀王府与成都三护卫》(《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史学60)细致地分析了宣德年间成都三护卫的调回、重编问题,探讨了明代诸王政策的变化与军事编制的实态;他的《再论“兵戈枪攘”:兀良哈征讨军与土木之变》(《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39)探讨了参加兀良哈征讨军的将帅们在土木之变及其后的攻防战中的活动。贞本安彦《明代镇守宦官的职务与三堂体制》(《立正史学》117)指出在明代广受非议的镇守宦官实际上与镇守总兵官具有同等的权限,除了监视、牵制武官外,并无更高的权力。荷见守义《实录与档案之间》(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研纪要》82)对照《明实录》与明朝的档案,探讨了明朝行政的实态。

清代的政治。有关八旗制度,本年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本是杉山清彦《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该书分析了大清帝国的构造与其作为“复合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形象,从当时的亚洲史、世界史的角度,论述了其形成过程与特征。另外一本是谷井阳子《八旗制度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作者从

八旗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构造、功能等多个角度,对于以往八旗制度研究中一些通行看法进行批评,重新评价了八旗制度的历史意义。梅山直也《皇太极的蒙古政治策略:左翼、右翼扎鲁特》(《社会文化史学》58)从清朝与扎鲁特的关系入手,通过系谱复原,探讨了蒙古编入八旗满洲这一特异的事例,说明了其在清初政治史上的重要意义。矶部淳史《崇德年间太宗属下的旗人》(《东洋学报》97-3)通过对镶黄旗的人员构成及其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说明了太宗政权重编镶黄旗的政治意图。铃木真《镶白旗雍亲王的家人们》(《社会文化史学》58)通过对后来成为雍正皇帝的镶白旗雍亲王胤禛及其第三子弘时属下的牛录的细致分析,探讨了八旗制度下牛录的实态。哈斯巴根(铃木展之、柳泽明译)《清初政治中的“质子”习惯》(《满族史研究》13,2014)通过对于“人质”这种政治习惯的分析,说明了清朝政治文化的特征。

泷野邦雄《清初的杨廷枢》(《经济理论》382)考察了因牵连反清运动而被处刑的杨廷枢的事迹;他的《顺治二年(1645)的苏州(二)》(《经济理论》379)、《南明政权的北来太子的对策》(《经济理论》380)、《从北来太子案看南明福王弘光帝(一)》(《经济理论》381)的系列论文考察了南明福王政权“北来太子”疑案,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真水康树《清代总督体制的成立过程》(《法政理论》47-3、4)从分权与集权的角度解读了明清时期省级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与形成过程。梁敏玲《清代广州都市行政区划的形成》(《东洋学报》97-2)着眼于广州的“捕属”、“捕属人”,从佐杂官的管辖范围探讨了都市行政区划的形成过程。村上政和《十八世纪北京的行列与庆典》(久留岛浩编《绘画中的行列》,东京大学出版社)分析了万寿盛典中戏剧的政治作用,说明了历代皇帝对戏剧态度的差异。水盛凉一《清朝后期中央政府的中下层官僚的初步考察》(《集刊东洋学》113)以清代户部为例,探讨了承担实际工作的“中下层官僚”的情况。党武彦《关于方观承撰写的〈燕香集(下)〉》(《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64)则是《燕香集(下)》的接续研究,解读了作为政治史史料的官僚的诗集。

地域社会。三木聪《传统中国与福建社会》(汲古书院)分析了传统中国结构下的明清至现代的福建社会。史习隽《徐光启的亲族关系与上海地域社会的天主教信仰》(《东洋学报》97-3)认为徐光启的亲族通过女性社会关系与经济援助等方式,对上海地区接受天主教产生了影响。浅沼かおり《清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常州观庄赵氏的历史(四)》(《共立国际研究》32)通过个案分析了地方名族的婚姻情况。魏郁欣《清代福建的宗族与坟树》(《东洋学报》97-1)从福建宗族墓地种植的坟树入手,讨论了宗族与风水之间的关系。熊远报《从收支记录看徽州家庭的日常生活》(《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68)根据残存的清代祁门王氏的家庭收支账簿,分析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与商业经济情况。

《东洋史研究》74卷3号为“巴县档案”特集，收录与诉讼案件有关的论文，其中除去性别史的论文外，多与地域社会有关。伍跃《“在民之役”——巴县档案所见乡约形象》认为乡约并非“乡村自治”的代表者，而是作为“准官吏”、“在民之役”的身份，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末端，这才是乡约的本来面目。小野达哉《清末巴县乡村的税收包揽与诉讼的关系》考察了与垫付赋税有关的诉讼案件，揭示了包揽的实态。夫马进《清末巴县的“健讼棍徒”何辉山与诉讼调解“凭团理剖”》通过对于诉讼社会中“健讼之徒”的个案分析，考察了制度与“健讼”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诉讼调停的实态。凌鹏《清代巴县农村的租佃实态》关注了交租纠纷的多义性、多样性，解读了巴县农村社会中地方与佃户之间的“抗租”、“骗租”、“主客关系”等重要概念。谷井阳子《清代中期重庆的商业界及其秩序》以当时的商业纠纷个案为例，探讨了当时商业秩序中人际关系的实态与得失。此外，水越知《清代后期重庆府巴县的寺庙与地方社会》（《史林》98-1）根据巴县档案中的寺庙档案，从多个角度分析当时巴县“祈祷”的空间，显示出宗教史研究中利用档案的可能性。

法制、诉讼。前文已经介绍了多篇有关诉讼案件的论文，这里将侧重介绍法制角度的成果。太田出《中国近世的罪与罚》（名古屋大学出版社）考察了中国近世犯罪的形态，探讨了伴随清朝承平之世到来后社会治安管理手段与收容犯罪者监狱的新变化，并通过与欧洲、日本进行比较，探讨中国近世社会的特点。江存孝《明代“杀死奸夫”条成立考》（《人间社会环境研究》30）考察了至明律为止的中国历代法律，一方面指出明律“杀死奸夫”条文起源于元代，另一方面通过对于法律注释书编纂的考察，说明了这一条文的逻辑结构。山本英史《清初地域社会中“光棍”的真实形象》（《史朋》48）从地方官的视角探讨了《大清律例》之“光棍例”在地域社会中的实际运用情况。堀川慎吾《讼师秘本对于〈律条公案〉的影响》（《集刊东洋学》113）论述了讼师秘本对于公案小说的影响。谷口规矩雄《浙江平阳县知县黄梅不法侵吞案——清代乾隆朝官僚贪污研究（五）》（《爱大史学》24）细致地考察了地方官的贪污案件，揭示出当时官场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主义风气。魏郁欣《有关坟树法律秩序的构筑》（《中国——社会与文化》30）以18世纪坟树的盗伐及相关法律的完善为例，探讨了国家对于宗族组织态度上的变化与社会秩序的安定化趋势。

文化、学术、史料。小塚由博《从张潮的书筒看〈虞初新志〉的编辑情况》（《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54）根据残存的张潮的书筒中的内容，分析从书编辑的情况，揭示出当时文人交流的另外一面。同氏《传递书筒的僧侣》（莲花寺佛教研究所《纪要》8）从书筒的传递者僧侣入手，通过对于张潮的书筒传递的分析，说明了清初文人与僧侣的交友关系。臼井佐知子《中国明清时代个人的记录》（渡边浩一等编《自传与记忆中的比较都市史》，勉诚出版）全面整理了明清时期个人的各种记

录,论述其史料价值与使用范围。玉置奈保子《从明代后期日用类书律例、律法门收录的歌诀看各种日用类书之间的关系》(《和汉语言研究》13)通过对于各种日用类书记载的对比研究,分析日用类书的性质与相互关系。山本英史《东亚官箴书的普及》(《史学》85-1、2、3)考察了中国官箴书在东亚各国的传播及各个国家各自的官箴书编纂情况,说明了管箴书的共通性与时代性。小二田章《万历〈杭州府志〉初探》(同上)通过对于明代后期编纂的地方志中对于宋代地方官的评价,说明了地方志记载的时代性。汤开建《明韶州同知刘承范的〈利玛传〉的发现及其内容与史料价值》(周力译,渡边义浩编《中国史时代区分的现在》)分析了刘承范撰写的利玛窦传记及其史料价值。陈支平(黑崎惠辅译《唐宋变革与明清实践》(同上)概述了宋代“理学”的历史变迁,分析政治权力对于理学选择与制度化的影响,重新探讨了理学的作用。新居洋子《十八世纪后半期在华耶稣会会士的中国史叙述》(《东方学》129)将钱德明的《中华帝国普遍史概说》与其他早期中国史著作的叙述手法进行了比较,说明了其中的连续性与差异性。吴修喆《明末日用类书中所见的灯谜》(《中国——社会与文化》30)通过对于日用类书中“灯谜”的比较分析,探讨了明末对于“灯谜”的认识及日用类书对于“灯谜”的影响。小松原中一《〈平定廓尔喀战图〉的制作过程及其意义》(《明大亚洲史论丛》19)考察了战图的制作过程,揭示出内务府制作铜版画的实际情况。桐藤薰《公认教会的原型》(《基督教文化》5)追溯了明清中国对于基督教神灵信仰概念的翻译与接受的过程,分析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政治与宗教问题的起源。

性别史。仙石知子《孝与贞节》(小浜正子编《性别的中国史》,勉诚出版)以孝与贞节为例,说明了中国近世有关女性的儒教规范如何内在化的过程。武内房司《彝族“女土官”考》(同上)考察了作为羁縻政策的一环,明朝初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任用“女土官”这一羁縻制度的变迁,论述了各方围绕女性长官而进行政治角力。五味知子《贞节与淫荡之间》(同上)分析清代与寡妇有关的诉讼案件,论述了贞操观念所具有的社会性。同氏《清代配偶杀人记录所见的女性形象与其实态》(《史学》85-1、2、3)统计了女性的配偶的杀人记录,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实态。同氏《中国“近世”的女性与家》(早川纪代等编《开创历史》,御茶水书房)梳理了有关女性的那些一成不变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原理与女性复杂多变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落差。水越知《清代后期的夫妇诉讼与离婚》(《东洋史研究》74-3)以同治时期巴县档案中夫妇之间的诉讼案件为例,说明了在不言自明的儒教伦理规范之下的传统中国的夫妇关系的实态。臼井佐知子《从诉讼文书看清代社会的女性》(同上)广泛地收集了与女性有关的诉讼文书,分析了女性在何种情况下提起诉讼以及诉讼中女性的立场。

国际关系、贸易。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名古屋大学出版会)通

过对于朝鲜前往北京、江户的使者的考察，解读并比较了当时东亚的国际关系，说明了通过使者而进行的学术交流活动。山本进《近世中朝贸易与青布》（《朝鲜学报》234）重新考证了低价的中国棉布在当时的中朝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辻大和《朝鲜对后金贸易政策》（川原秀城编《朝鲜王朝后期的社会与思想》，勉诚出版）分析了1630年前后朝鲜对后金的贸易，说明了朝鲜在当时东亚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铃木开《从〈满文原档〉看朝鲜国王的称呼》（同上）探讨了满文史料中朝鲜国王称呼的变化，考察了朝清关系的特点。同氏《朝鲜、后金间的使者往来（1631—1633）》（《骏台史学》155）分析了后金两次侵略朝鲜期间的使者往来情况，从整体的角度说明了当时的两国关系。辻大和《丙子之乱后朝鲜的对清贸易》（《内陆亚洲史研究》30）分析了丙子之乱后，朝鲜对清贸易的结构与变化。木村可奈子《日本基督教禁令之下可疑船只的转送请求与朝鲜的对清、对日关系》（《史学杂志》124-1）考察了由于耶稣会传教士潜入日本而引发日本向朝鲜提出转送可疑船只的事件，分析了朝鲜的应对措施，重新探讨了明清交替时期朝鲜的对清、对日关系。程永超《中日观察的比较》（《东亚的思想与文化》7）比较了同时具有通信使与燕行使身份的赵珩在两地的见闻，认为两种使节的性质有所不同，体现出日朝、中朝关系的多面性。

村井章介主编《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勉诚出版）以“遣明船”为中心，不仅从日本，而且从明朝、朝鲜、琉球等各个亚洲国家的视角出发，展示出14至16世纪国际交流史的多样性。Olah Csaba《日明贸易中的商业习惯与信用交易》（《历史学研究》928）以日明贸易的商业纠纷为例，论述了明代贸易中外国人与明人之间商业交易的实态。冈本真《“堺渡唐船”与日本战国时期派出的遣明船》（《史学杂志》124-4）详细地说明了宁波之乱后，大内氏以外的人派出“堺渡唐船”情况。吴鸿盛《元末明初的日本禅僧聪闻极的事迹》（《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43）整理了元末明初一位日本禅僧的事迹，广泛地描写了他的活动。高桥亨《日本出兵朝鲜前后明代中国的日本认识》（《米泽史学》31）将日本出兵朝鲜前后明朝人编写的日本研究专书《日本考》与《续文献通考》进行了比较，指出当时明朝人对日本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上田信《海贝、云南、帝国》（《历史学研究》937）考察了元朝、明朝作为货币的海贝的交易与流通情况。池谷望子《朝贡中国的琉球马及其特征》（《南岛史学》82）考察了琉球朝贡中国的琉球马与明代的军马情况。松浦茂《1726年弗拉季斯拉维奇在北京（下）》（《亚洲史论集》9）作为系列论文的最后一篇，详细地考察了恰克图条约签订前期北京会议的详细情况，重新探讨了其历史意义。

海域世界。东洋文库编《东印度公司与亚洲海盗》（勉诚出版）收录了有关东印度公司进入亚洲后与其相伴而生的当地海盗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收录了中岛乐章《海商与海盗之间——徽州海商与后期倭寇》、柯兰（Paola Calanca）《1620—1640年间中国沿海的商业与海盗行为》、深濑公一郎《屏风中描绘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活

动》、丰冈康史《“中国海盗”形象的源流》等与明清史有关的论文。须田牧子《倭寇研究(特定共同研究)三年成果》(《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纪要》25)概要介绍了有关倭寇绘画资料的比较研究情况。板仓圣哲《苏州片与〈倭寇图卷〉、〈抗倭图卷〉》(同上)分析了《倭寇图卷》等描绘倭寇的代表性绘画,说明了“苏州片”在绘画史上地位。山崎岳《船主王直功过考(下篇)》(《东方学报》京都90)以王直为中心,全面总结了维持东亚海域稳定的势力集团的意图以及其对“倭寇”政策判断失误的始末。郭扬《从海澄攻防战(1678—1680)看清朝与郑氏势力》(《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43)透过华人海商的视角重新认识了清朝与郑氏势力在海澄县进行的攻防战,说明了“唐船风说书”的史料价值。八尾隆生《黎朝圣宗的目标》(《东洋史研究》74-1)比较了黎朝与琉球的对外活动,认为15世纪的大越开始对“农业史观”提出了异议,并且不断扩大在东亚、东南亚海域的对外贸易活动。池谷望子《行船更数的确定方法》(《海事史研究》72)广泛地搜集各种史料,细致地考察了明清中国船只的航程单位“更”的用法。松浦章《18至19世纪澳门的海外贸易船》(《关西大学文学论集》65-1)详细地考察了16世纪中叶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后的澳门贸易船只的情况。中岛乐章《最早的葡萄牙系的东亚地图》(《史渊》152)论述了作为最早的葡萄牙系统的东亚地理情报的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世界地图在地图史上意义。松浦章《从清代帆船看东亚、东南亚海域的人员与物资流动》(《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8)探讨了清代中国帆船在亚洲海域的角色与作用。

内政事务。西川和教《云南中华世界的膨胀》(庆友社)考察了云南的汉族移民史,重新评价了王朝主导型移民中存在的自律性、动态性特点,认为其与民间主导型移民具有相辅相成的效果,从而扩大了中华世界。野崎くるみ《从九世达赖喇嘛的选定看清朝》(《社会文化史学》58)考察了选定九世达赖喇嘛的“二十九条章程”所规定的金瓶掣签制度在西藏一方的解释与运用,并说明了清朝的恭顺姿态,从另外的视角分析了当时的清朝与西藏的关系。岩田启介《禁约青海十二事的成立》(《满族史研究》13,2014)考察了清朝政府向青海蒙古颁布的“禁约青海十二事”成立的背景与效果,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阿拉木斯等《清代土地制度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名古屋产业大学论集》26)分析了清代盟旗制的导入、内蒙古的汉族移居与蒙古人的定居化等问题。堀内香里《清代后期喀尔喀蒙古旗内行政统治中印务处的功能》(《东北亚研究》19)通过对印务处的实际功能与作用的分析,说明了清朝实行的盟旗制与蒙古固有统治体制的二重构造特点。蒙古勒呼《乾隆前半期察哈尔八旗的审判》(《史观》173)探讨了察哈尔八旗审理命盗案件的法律与诉讼程序,揭示出八旗与蒙古实际运作过程中的二重性。

小沼孝博《吐鲁番绿洲社会的分割》(《历史与地理》686)考察了处于清朝与准

噶尔夹缝中的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依存关系消亡的过程，描述了 18 世纪欧亚大陆中部世界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氏《“异人”形象的政治性》（《东洋文化研究》17）分析了 18 至 19 世纪清朝与中亚相互认识的差异以及其中包含的政治性。早川尚志《明代西域的商业路线及其变迁》（《al-Rafidan: 西亚研究》36）通过现存史料分析了西域商业路线的变迁与兴废，为动态理解这一地区提供了线索。

展望。以上介绍了管见所及的相关研究成果。坦率地说，财政、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而国际关系、周边中国史则广受重视，运用档案史料与诉讼文书的成果也引人注目。当然，此种印象的产生也可能是由于分类的随意性造成的。关于财政史、经济史研究，水岛司、加藤博、久保亨、岛田龙登编《亚洲经济史研究入门》（名古屋大学出版社）第二章（岸本美绪著）简明扼要地介绍这一时期的经济史。彭慕兰《大分流》的日译本（川北稔监译，名古屋大学出版社）也终于出版，这部曾经引起广泛争论的著作或许可以激发更多比较史视野下的讨论。当然，这种比较史的方向性，本文已多次提及，但经济史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岸本美绪《德治的构造》（《中国——社会与文化》30）关注了价值观不同的人是如何共存这一“共存问题”，从比较史的立场论述了清代前期的政治、思想情况。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对话这种宏观性讨论，不仅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而且对于眼见所及的中国现代以至于未来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随着可利用的档案史料的价值与数量不断增加，一方面利用这些史料，弄清细节，以推进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如何推进整体历史形象的反馈，如何认定问题与研究潮流，还有很多探讨的余地。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而不能有所偏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批准号：14ZDB024）的阶段性成果；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 125 编第 5 号《2015 年的历史学界》

（责任编辑：李成燕）